

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应用如何缓解 乡村居民风险厌恶态度？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微观数据的分析

张世虎 顾海英

摘要：在中国城乡分割的发展时期，由于地理和制度隔离，乡村居民在信息获取渠道与能力方面相对于城镇居民一直处于劣势地位。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一些乡村居民厌恶风险、因循守旧，而乡村居民的风险厌恶态度引致了诸多乡村发展困境。本文认为：破解乡村发展困境，重视“内因”改造——即改变存在于乡村居民群体中不利的思想观念是重要抓手。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信息技术的普及则为此提供了现实机遇。本文选取乡村居民为研究对象，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微观数据，评估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应用对乡村居民风险态度的重要影响。研究发现：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应用可以显著提升乡村居民的主观与客观风险偏好程度。虽然乡村居民对互联网的使用方式与目的各有不同，但是无论是何种使用方式与目的，使用频率越高的群体，其风险态度所受正向影响越显著。本文还针对乡村居民的个体特征展开了异质性分析，发现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应用对那些有主动学习习惯、受教育年限长、财富水平高和有过人生重大经历群体的风险态度的正向影响更大。

关键词：互联网 乡村居民 风险态度 乡村振兴

中图分类号：F325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个体总是在不确定的条件下进行各种决策。不确定性带来了风险，而对待风险的态度则是影响个体决策的重要因素之一。有研究发现，风险态度是解释居民储蓄、消费、投资、择业、保险与医疗支出等一系列行为决策的重要因素之一（Djankov et al., 2006; Caliendo et al., 2010; Pfeifer, 2011; Banks et al., 2019），因此研究居民风险态度的影响因素有利于更好地理解个体的各种行为决策。

在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中，长时间城乡分割的体制引发了诸多城乡差距问题（张海鹏，2019）。并且由于地理和制度隔离，乡村居民在信息获取渠道与能力方面相对于城镇居民一直处于劣势地位。信息获取渠道的匮乏和信息获取能力的不足在客观上导致了一些乡村居民持有厌恶风险的态度（Ghadim et al., 2005; 高杨、牛子恒，2019）。这种风险厌恶态度引致了诸多乡村发展的困境，例如，由于厌恶

风险、因循守旧，农户对新型农业技术采纳率低，阻碍了新技术和新品种在乡村区域的推广（Liu, 2013; Bradford et al., 2015; Gao et al., 2017）；降低了农户生产中的资本型投入（侯麟科等，2014）；增大了农业生产过程中农药的用量（黄季焜等，2008）；影响了农民对农业信贷和保险的参与度（许承明、张建军，2012）；影响了乡村居民的非农就业选择（陈波，2009）等。

目前中国的乡村振兴战略正在大力推进，如何建立起乡村脱贫和良性发展的长效机制是本文认为应当重点关注的问题。振兴乡村不仅要着眼于外因，即改善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向城市的单向流动，破解乡村区域存在的生产要素长期匮乏和发展能力持续下降的局面；更要重视内因，即要改变不利于乡村居民良性发展的思想观念。要改变乡村的贫困面貌、破解乡村发展面临的困境，改变存在于乡村居民群体中厌恶风险、因循守旧的思想观念是重要抓手。

随着通信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和智能设备的普及，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应用拓展了居民的信息获取渠道、提高了居民获取信息的质量，全方位提升了居民获取信息的能力。信息技术的普及在信息获取模式方面为社会带来了全新的革命。面对不断深化的社会信息化进程，信息技术的应用不仅改变了居民生活、工作的方方面面，而且对居民的思想观念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江小涓，2017；王迪、王汉生，2016）。特别是对乡村居民来说，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智能设备的普及使得居民的生活真正全方位地融入了信息化时代。信息技术的应用极大地拓展了乡村居民的信息获取渠道，提升了其信息获取能力。因此从边际改善的角度来看，信息技术的应用对乡村居民群体思想观念的影响应该更加显著。现实生活中，在资源匮乏的乡村，普惠的信息技术以其低成本、便捷性的特点在信息扩散方面对乡村居民思想观念造成了巨大冲击，乡村居民反过来对信息社会活动的积极参与也引发了诸多新型社会现象。比如“草根网红”比明星更有人气、“直播带货”比传统渠道销量更高、农村电商蓬勃发展、淘宝村数量指数式增长等。在目前乡村振兴战略大力推进、乡村面临社会变革的历史节点，相关研究的视角有必要聚焦于乡村，对乡村经济现象与问题做更细致、深入的讨论。因此，与其他相关研究选择城镇居民为关注对象不同的是，本文把视角集中于乡村居民群体，讨论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应用通过改变乡村居民的信息获取模式对其思想观念特别是风险厌恶态度转变的独特影响。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为引言；第二部分对相关文献进行回顾与评述；第三部分介绍数据、实证模型和变量设置；第四部分为统计描述与计量分析；第五部分进一步讨论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应用对乡村居民风险态度影响的异质性；第六部分为全文总结。

二、文献综述

（一）居民风险态度的度量

要实证分析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应用与乡村居民风险态度之间的关系，准确测度乡村居民的风险态度是必要前提。现有研究主要用以下两种方法测度居民的风险态度：一是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根据被调查者对相关测试问题的回答构造居民的风险态度变量（例如 Gary and Angelino, 2012）。这属于被调查者对其风险态度的主观评价，通过这种调查方式得出的居民风险态度被证明对居民的客观风险行为具有良好的解释能力（Guiso and Paiella, 2008）。二是通过调查问卷数据构造居民客观风险态度变量，

即根据居民对风险市场的参与或是风险资产的持有等行为指标构造居民客观风险态度变量（例如 Cocco, 2005；刘潇等, 2014；陈永伟等, 2015）。通常情况下，问卷测试得到的居民声称的主观风险态度与居民的风险行为所表现出的客观风险态度具有一致性。也就是说，声称高风险厌恶的人相比声称高风险偏好的人更不可能持有风险资产。但也有学者发现，由于两种风险态度的评价角度一个为主观，一个为客观，因此会存在着主客观风险态度不一致的现象（Hanna and Chen, 1997；李烜等, 2015）。

（二）居民风险态度的影响因素

居民的风险态度受哪些因素影响呢？总结现有文献，居民的风险态度与其个体特征等变量显著相关。年龄（Gollier, 2002）、性别（Dohmen et al., 2011）、性格（Buccioli and Zarri, 2017）、认知能力（Bonsang and Dohmen, 2015）、受教育年限（Kapteyn and Teppa, 2011；Outreville, 2013）、婚姻状况（Arrondel and Lefebvre, 2001）、健康状况（Hammit et al., 2009）、事件冲击（陈永伟、陈立中, 2016；Banks et al., 2019）、工作变动（Sahm, 2012）、财富水平（Haliassos and Bertaut, 1995）、社会资本（陈其进和陈华, 2014）等因素均显著影响居民的风险态度。

现有研究认为，由于信息、知识和禀赋的限制，厌恶风险的观念普遍存在于乡村居民群体中，而乡村居民的风险厌恶态度既不利于农业技术的采用和扩散（Liu, 2013；Brick and Visser, 2015；毛慧等, 2018），也不利于乡村居民多渠道非农就业（陈波, 2009），阻碍了乡村居民的良性发展。理论上，信息技术在乡村地区的普及可以增强乡村居民的信息获取能力，从而丰富其生产经营信息，增强其技术知识和经验储备，降低乡村居民决策过程中的各种不确定性，从而缓解乡村居民群体的风险厌恶态度（Ghadim et al., 2005）。并且现有关于个体风险态度的研究也表明，居民风险态度受到其获取信息的多寡（Wijayaratra and Dixit, 2016）和信息地位的直接影响。知识性信息获取的多寡导致个体对具体事物抱有不同认知。例如，从 2019 年底暴发的全球性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中可以观察到：对新冠病毒相关知识信息了解的差异使不同群体面对疫情具有显著的风险偏好差异（Honarvar et al., 2020），这种差异导致了个体应对疫情截然不同的行为（选择戴或不戴口罩，是否遵循居家隔离政策等）。还有一些研究发现，个体在做具体决策的时候，不同的信息集约束反映着个体所处的不同信息地位，此时个体的风险态度除了受其个体特征影响外，还与其信息地位有关。在面临小概率事件时，个体通常偏好风险，而面临大概率事件时，个体则会规避风险（Fenghua, 2013）。

随着社会信息化的不断深入，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普及显著改进了乡村居民在获取信息方面的不足。互联网通过拓展乡村居民的信息获取渠道、增强其信息获取能力、提升其信息地位，改变了其信息获取模式。虽然已有研究指出了风险厌恶态度对乡村居民的良性发展具有不利影响，但是鲜有文献讨论在信息化时代，信息技术的应用通过改变乡村居民信息获取模式对其风险厌恶态度转变的重要影响。在中国，乡村居民尚有 5.6 亿人，乡村居民在个体特征、资源禀赋、生活习惯、思想观念和信获取渠道方面均与城镇居民有着显著的差异。已有的针对城镇居民或是金融市场投资者风险态度的一些研究结论可能并不适用于乡村居民群体。在中国目前乡村振兴战略大力推进的历史进程下，增加对乡村居民以及乡村问题的关注则是现实的迫切需要。针对以上研究空间，本文以乡村居民为关注对象，运用微观调查数据，细致讨论信息技术在乡村地区的普及如何影响乡村居民的风险态度。

相比以往研究，本文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新的尝试：第一，选取乡村居民为关注对象，运用微观数据，度量乡村居民的主观与客观风险态度，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验证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应用是否能显著缓解乡村居民的风险厌恶态度，从而扩展对居民风险态度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第二，在实证分析得出的基本结论基础上，本文就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应用对乡村居民风险态度的影响进行了异质性分析，从而探讨其作用的微观机理，指明在何种条件下信息技术的应用能更好地发挥作用，以期对精细化、目标化政策实施提供有益参考。

三、模型与数据

（一）模型设置

1.主观风险态度影响模型。主观风险态度变量为有序离散变量，本文建立一个 Ordered Probit 模型来讨论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应用对乡村居民主观风险态度的影响。

2.客观风险态度影响模型。客观风险态度变量为二元离散值，本文建立一个 Probit 模型来讨论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应用对乡村居民客观风险态度的影响。模型中代表客观风险态度的风险资产持有行为为被解释变量，该变量取值为 0 或 1，其背后存在一个连续的潜变量，这个潜变量可以理解为风险投资行为给个体所带来的净效用，当净效用为正时，个体选择持有风险资产，反之个体选择不持有风险资产。是否持有风险资产构成了这个潜变量的可观测值。潜变量和 Probit 模型的表达式如下：

$$Invest_i^* = \beta_0 + \beta_1 \times ICT_i + \beta_2 \times X_i + \varepsilon_i \quad (1)$$

$$Prob(Invest_i = 1) = Prob(Invest_i^* > 0) = \Phi(\beta_0 + \beta_1 \times ICT_i + \beta_2 \times X_i + \varepsilon_i) \quad (2)$$

其中 ICT_i 代表个体 i 对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应用变量， X_i 为个体 i 和其所在家庭的一系列特征控制变量。 ε_i 为随机扰动项。系数 β_1 衡量了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应用对乡村居民客观风险态度的总体影响。

（二）变量构建

1.被解释变量。根据已有的研究，居民的风险态度分为主观风险态度和客观风险态度。在一些居民中存在着主观风险态度与其行为所反映的客观风险态度不一致的情况（李焯等，2015），因此为了稳健分析乡村居民风险态度的影响因素，本文也使用两种方法度量乡村居民的风险态度。一是根据问卷调查试验问题的回答数据构造乡村居民的主观风险态度变量。本文利用 2018 年 CFPS 调查问卷中“行为与精神状态”部分的一系列风险试验结果数据构造乡村居民的主观风险态度变量。根据被调查样本回答所表现出来的风险偏好水平，本文把居民的主观风险态度分为 6 个等级，分别赋值 1~6。数值越大说明风险偏好水平越高。二是用是否持有风险资产代表乡村居民的客观风险态度。之所以不采用居民持有的股票、债券等风险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来代表居民的客观风险态度，原因是 CFPS 问卷调查中关于风险资产持有数量的数值缺失较多，无法准确衡量风险资产的比例。因此本文用是否持有风险资产（张光利、刘小元，2018）这种客观风险行为作为乡村居民客观风险态度的代理变量。

2.核心解释变量。本文使用 2016 年 CFPS 成人调查问卷中乡村居民个体对问题“互联网对您获取

信息的重要性（1表示非常不重要，5表示非常重要）”的回答数据构造互联网信息技术应用变量。取值1~5代表乡村居民个体对使用互联网获取信息的依赖度依次增加。另外在模型的稳健性分析中，本文还利用该调查问卷中乡村居民样本对“是否移动上网”“是否使用手机”等问题的回答数据构造了互联网信息技术应用的替代变量，代入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

本文关注的互联网信息技术应用变量之所以采用2016年的调查数据构造，原因如下：①从2014年下半年开始，伴随着廉价移动智能设备的普及，中国4G高速通信网络才开始了大规模应用。由此引发的移动互联网浪潮的到来才使得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开始全面地对社会各个群体的生产与生活产生影响。特别是本文所关注的乡村居民群体，在之前的个人计算机时代，他们中的大部分还被排除在信息化的影响之外，但是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乡村居民也得以通过样式繁多的智能设备接入互联网，从而扩展自身的信息获取渠道，增强自身的信息获取能力。从这一时期开始，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改变了乡村居民获取信息的模式。因此，根据理论与实际分析，2016年的数据基本可以反映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到来之后，乡村居民对互联网信息技术应用的初始状态，并且这种初始状态主要是受信息基础设施完备和智能设备普及等外生因素的影响。②信息获取模式的改变引发居民思想观念的转变是一个需要时间积累的缓慢过程，因此模型使用2016年的数据构造核心解释变量实际上是对解释变量做了一个滞后处理，使模型可以更为准确地衡量出其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效果。

同时，为了在信息来源方面控制其他信息渠道的影响，本文还利用CFPS调查问卷中乡村居民对问题“电视作为信息渠道的重要性”“报纸、期刊杂志作为信息渠道的重要性”“他人转告作为信息渠道的重要性”的回答数据构造了三个传统信息获取渠道变量。在模型中加入传统信息获取渠道变量后，一方面可以更为准确地识别信息技术的应用通过改变信息获取渠道对乡村居民风险态度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可以对比两种信息获取渠道影响的大小、显著性差异，以反映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应用对乡村居民风险态度影响的重要性。

3.其他控制变量。基于现有相关研究的处理，本文还控制了对居民风险态度产生影响的其他变量。其中个体特征变量包括：年龄、性别、健康状况、受教育年限、婚姻状况、主动学习意识、社会资本等变量。在中国的大部分乡村地区，仍然保留着人情社会的传统，乡村居民的社会资本可以显著影响其风险态度（陈其进、陈华，2014）。在本文研究中，乡村居民的社会资本用社会信任和社会网络两个变量来描述。本文利用CFPS调查问卷中被调查样本对问题“你有多信任陌生人”的回答数据构造社会信任变量，利用受访者与其亲戚、朋友、熟人的社会互动情况构造社会网络变量。家庭特征变量包括：家庭人口、家庭人均年收入、自有房产价值、家庭财富、家庭负债情况等变量。

（三）数据说明

本文所使用的微观数据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微观数据库2014年、2016年与2018年的调查数据。这一数据库调查样本涵盖了中国25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除港澳台地区、新疆、西藏、青海、内蒙古、宁夏、海南）。该数据库包括个体、家庭的社会经济信息，有比较详细的家庭经济活动、社会交往、人口统计等方面的数据。基于本文所关注的问题，经过对相关数据进行合并整理，共获得样本22058个。

四、统计分析与计量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

表1报告了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情况。其中，乡村居民对各项信息获取渠道的重要性评价均值由高到低依次是“电视”(3.1936)、“他人转告”(2.7984)、“互联网”(2.7539)、“报纸、期刊杂志”(1.7142)。这与乡村居民生活的现实情况是一致的。“电视”是目前普及率最高的家电之一，乡村生活中人际交往对获取信息也有其独特的作用，这两点使得“电视”与“他人转告”成为乡村居民最为重要的两个信息获取渠道。但是从时间维度看，相比于表1中2016年乡村居民对各项信息获取渠道的重要性评价数据，2018年乡村居民对“电视”渠道获取信息的重要性评价均值下降了4.5%，而对“互联网”获取信息的重要性评价均值则上升了24.3%，对“他人转告”和“报纸、期刊杂志”渠道的评价均值则没有大幅度的变化。这说明随着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在乡村的普及，虽然平均意义上乡村居民群体对互联网获取信息的重要性评价尚不及传统的“电视”“他人转告”渠道，但是互联网作为新的信息来源的重要地位在不断增强。

表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样本	均值	标准差
风险态度	主观风险态度	风险偏好程度：1~6逐次升高	21605	2.2931	1.8032
	客观风险态度	是否持有风险资产：是=1，否=0	22058	0.0180	0.1343
信息获取方式	互联网信息技术	对互联网途径获取信息的重要性评价：1~5不断升高	22041	2.7539	1.6414
	传统信息渠道1	对电视途径获取信息的重要性评价：1~5不断升高	22049	3.1936	1.3878
	传统信息渠道2	对报纸、期刊杂志途径获取信息的重要性评价：1~5不断升高	22058	1.7142	1.0891
	传统信息渠道3	对他人转告途径获取信息的重要性评价：1~5不断升高	22024	2.7984	1.3421
个体特征变量	性别	男=1，女=0	22058	0.4942	0.5001
	年龄	年龄值	22058	46.0702	16.7601
	主观健康评价	不健康=1；一般=2；比较健康=3；很健康=4；非常健康=5	22055	2.9843	1.2573
	婚姻状况	未婚=1，在婚=2，离婚或丧偶=3	22058	1.9301	0.4593
	受教育年限	个人实际受教育年限	20935	6.6947	4.8371
	是否汉族	是=1，否=0	22058	0.9474	0.2231
	主动学习意识	平时是否读书：是=1，否=0	22058	0.2172	0.4131
	是否讲普通话	访问时是否讲普通话：是=1，否=0	22058	0.5353	0.4976
	外貌	访谈者对受访者的外貌评分：1~7，1很差，7很好	17389	5.2775	1.2942
	社会信任	对陌生人的信任度的打分：1~10逐次升高	21993	2.2090	2.2241
	社会网络	人情礼支出占家庭总收入比例	21781	0.1010	0.2602
家庭特征变量	家庭人口	家庭总人口数	21976	4.2533	2.1442
	家庭人均年收入	家庭人均年收入的的对数	21005	9.3611	0.9702
	自有房产价值	自有房屋市场价值的对数	21839	12.0410	1.3533

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应用如何缓解乡村居民风险厌恶态度？

	家庭财富	现金、银行存款、股票等资产总额（住房除外）的对数	15048	9.9260	1.5561
	家庭负债	是否有待偿亲友及民间借贷（是=1，否=0）	22058	0.1874	0.3904
互联网 使用方 式	学习	使用互联网搜索学习资料、上网学习课程等的频率：1~7不断升高	10575	3.2229	2.4011
	工作	使用互联网工作的频率：1~7不断升高	8047	3.2478	2.6891
	社交	使用互联网聊天、发微博的频率：1~7不断升高	10572	5.9823	1.7700
	娱乐	使用互联网看视频、听歌的频率：1~7不断升高	10577	5.6171	1.9074
	商业	使用互联网购物的频率：1~7不断升高	10575	3.3519	2.0344

（二）实证模型结果

1. 互联网信息技术应用与乡村居民的主观风险态度。根据前文模型设置说明，本文采用 Ordered Probit 模型分析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应用对乡村居民主观风险态度的影响。表 2 汇报了相关模型的回归结果。根据（1）列和（2）列所示，无论是否控制传统信息获取渠道变量，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应用均在 1%统计水平上对乡村居民的主观风险态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表明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普及所带来的信息获取模式的改变的确通过信息效应提升了乡村居民的主观风险偏好程度，乡村居民对应用互联网获取信息的依赖度越高，其主观风险偏好程度越强。传统信息渠道 1 与乡村居民主观风险态度无显著相关关系，传统信息渠道 2 在 5%统计水平上对乡村居民的主观风险态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传统信息渠道 3 在 5%统计水平上对乡村居民的主观风险态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表明，电视作为乡村居民获取信息的一种渠道，其并不能通过提升乡村居民的信息获取能力而影响其风险态度。可能的原因有：通过电视，乡村居民只能被动地获取信息，不能主动选择自己需求的信息，居民的信息获得感不强。并且在生活中，观看电视节目通常被作为一种闲暇消遣活动，电视对提升乡村居民信息获取能力的作用非常有限，因此其对乡村居民思想观念没有显著影响。而报纸、期刊杂志则多涵盖一些政治、经济、社会 and 农业生产技术方面的信息，并且乡村居民可以主动地选择接受自己所需的信息，因此该信息渠道提升了乡村居民获取“正式知识”的能力，从而有助于乡村居民提升对自身以及所处环境的认知。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乡村居民群体的风险厌恶态度。并且正因为风险厌恶态度广泛存在于乡村居民群体中，如果在信息获取过程中过于依赖他人告知，则不利于乡村居民自身风险厌恶态度的转变。在实践生活中，乡村居民也通常会有这样的经历：自己将“新想法”“新计划”与他人分享的时候，通常会被“泼冷水”而不是得到鼓励与支持。因此，过于依赖他人转告获取信息也不利于乡村居民风险偏好程度的提升。

对于控制变量，性别、婚姻状况、主动学习意识、是否讲普通话、外貌、社会信任、社会网络、家庭人口等变量皆与主观风险态度变量呈不同程度的显著正向相关关系。本文没有发现家庭人均收入、自有房产价值和家庭财富等变量与乡村居民主观风险态度之间的显著相关关系。与相关研究发现的房产价值与居民风险偏好相关（张光利、刘小元，2018）的结论相比，以上结果体现了乡村居民与城镇居民主观风险态度影响因素之间的差异。对于乡村居民来说，其房产一般是自有宅基地住房，其生活保障属性大于其财富和投资属性，因此房产价值并不会对乡村居民的主观风险态度产生显著影响。

2. 互联网信息技术应用与乡村居民的客观风险态度。沿袭相关文献的做法 (Hanna and Chen, 1997; 张光利、刘小元, 2018), 本文使用是否持有风险资产代表乡村居民的客观风险态度。本文所指的风险资产为金融资产, 包括股票、基金、国债、信托产品和外汇产品。本文使用 Probit 模型分析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应用与乡村居民客观风险态度之间的关系。表 2 中 (3) 列、(4) 列的回归结果显示, 无论是否控制传统信息获取渠道变量, 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应用均在 1% 统计水平上对乡村居民的客观风险态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表明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应用也显著提升了乡村居民的客观风险态度。乡村居民对应用互联网获取信息的依赖度越高, 其客观行为所表现出的风险偏好程度也越强。另外, 三种传统信息获取渠道变量均不显著, 与前文相比, 这体现了主客观风险态度影响因素之间的差异。

对于控制变量, 年龄、健康状况、主动学习意识、是否讲普通话、外貌、家庭人均收入、自有房产价值、家庭财富、家庭负债等变量均与乡村居民客观风险态度呈不同程度的显著正向相关关系。另外, 客观风险态度影响模型中有一些变量的显著性水平和系数符号与主观风险态度影响模型的结果存在差异, 如年龄、社会网络变量。其中年龄对主客观风险态度影响不一致的原因可能是: 随着年龄的增大, 人们通常会持有更加保守的态度, 规避不确定的风险。因此随着年龄的增大, 主观风险偏好程度降低。但是, 即使是主观上的风险规避者, 如果有较长的投资期限, 则个体更倾向于持有风险资产提升其整体效用 (Hanna and Chen, 1997)。换句话说, 个体的年龄越大, 即投资期限越长, 其主客观风险态度越有可能出现不一致的现象。因此在考虑到投资期限之后, 这一现象是合理的 (李焯等, 2015)。而对于社会网络变量, 本文用人情支出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表示。人情支出的比例越高, 说明乡村居民的社会交往越广泛, 这有利于提升其主观方面的风险偏好程度, 但另一方面人情支出比例过高占用了其收入资源, 不利于乡村居民对风险资产的投资。因此社会网络变量与客观风险态度之间呈显著的负向相关关系。

表 2 互联网信息技术与乡村居民风险态度

变量	主观风险态度		客观风险态度	
	(1)	(2)	(3)	(4)
互联网信息技术	0.0518*** (0.0091)	0.0496*** (0.0094)	0.0789*** (0.0271)	0.0774*** (0.0277)
传统信息渠道1		-0.0110 (0.0091)		-0.0044 (0.0280)
传统信息渠道2		0.0282** (0.0117)		-0.0246 (0.0275)
传统信息渠道3		-0.0216** (0.0094)		0.0230 (0.0330)
性别	0.0949*** (0.0242)	0.0967*** (0.0242)	-0.0990 (0.0708)	-0.1018 (0.0710)
年龄	-0.0147*** (0.0011)	-0.0143*** (0.0012)	0.0079** (0.0036)	0.0080** (0.0037)
主观健康评价	0.0065	0.0059	0.0707**	0.0710**

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应用如何缓解乡村居民风险厌恶态度？

	(0.0099)	(0.0099)	(0.0307)	(0.0309)
婚姻状况	0.0698**	0.0707**	0.1730*	0.1725
	(0.0327)	(0.0328)	(0.1051)	(0.1053)
受教育年限	-0.0010	-0.0020	0.0120	0.0104
	(0.0033)	(0.0034)	(0.0103)	(0.0104)
是否汉族	-0.0337	-0.0241	-0.3494*	-0.3524*
	(0.0781)	(0.0784)	(0.2031)	(0.2030)
主动学习意识	0.0757**	0.0606*	0.1553*	0.1451*
	(0.0320)	(0.0324)	(0.0829)	(0.0842)
是否讲普通话	0.0386	0.0415*	0.1232*	0.1190*
	(0.0243)	(0.0243)	(0.0723)	(0.0723)
外貌	0.0199**	0.0219**	0.0812***	0.0806***
	(0.0099)	(0.0098)	(0.0306)	(0.0305)
社会信任	0.0168***	0.0165***	-0.0240	-0.0220
	(0.0055)	(0.0054)	(0.0164)	(0.0165)
社会网络	0.2493**	0.1481***	-1.5072***	-1.4993***
	(0.0998)	(0.0504)	(0.5610)	(0.5611)
家庭人口	0.0121*	0.0110*	-0.0190	-0.0200
	(0.0063)	(0.0060)	(0.0195)	(0.0196)
家庭人均年收入	0.0230	0.0171	0.1551***	0.1568***
	(0.0169)	(0.0160)	(0.0568)	(0.0569)
自有房产价值	-0.0034	-0.0039	0.2620***	0.2641***
	(0.0100)	(0.0097)	(0.0320)	(0.0321)
家庭财富	0.0004	0.0006	0.2581***	0.2572***
	(0.0071)	(0.0069)	(0.0266)	(0.0266)
家庭负债	0.0249	0.0261	0.2894***	0.2944***
	(0.0291)	(0.0291)	(0.0710)	(0.0711)
常数项			-10.9401***	-10.9003***
			(0.6581)	(0.6663)
样本数	10789	10779	10936	10920

注：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3.主客观风险态度影响因素的异同。综合表2模型估计结果可以看出，两类风险态度的主要影响因素并不完全相同。对于主观风险态度，个体特征变量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对于客观风险态度，除了个体特征变量的影响，家庭经济特征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这与两类风险态度的度量方法有关，面对主观风险态度的调查问题，乡村居民的回答更多地反映了其个体特征，而对于代表客观风险态度的风险资产投资，居民的决策不仅取决于个体特征，还取决于其家庭经济状况，即可支配资源的约束。因此本文发现：不仅个体的主观风险态度和客观风险态度会存在表现不一致的现象，而且主观风险态度和客观风险态度各自背后的影响因素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五、进一步讨论

（一）互联网信息技术、使用方式与风险态度

以上的模型结果验证了：无论以主观风险态度还是以客观风险态度来衡量，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应用均显著缓解了乡村居民群体的风险厌恶态度。进一步地，在现实生活中，居民对互联网的使用方式与获取信息的目的各有侧重，一个自然而然的问题就是：互联网使用方式或目的存在的差异是否会造其成对乡村居民风险态度有着不同的影响？Bargh and McKenna（2004）的研究也表明，互联网对使用者的影响大小取决于其对互联网的使用方式。如果说互联网信息技术可以通过改变乡村居民获取信息的模式改善乡村居民风险厌恶的态度，那么一个合理的预期是：对互联网信息技术不同的使用方式会对乡村居民的风险态度产生不同的影响效果。

在以下模型中，本文利用CFPS调查问卷中乡村居民使用互联网进行学习、工作、社交、娱乐和商业活动的频率数据对整体样本进行分组，进而实证分析互联网信息技术对不同使用方式样本风险态度的异质性影响。表3~表7展示了不同使用方式分组样本的模型回归结果。从结果可以看出，虽然对互联网的使用方式各有不同，但是使用频率越高的群体，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应用对其风险态度的影响越显著。而对使用频率低的群体，多数模型中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应用对风险态度无显著影响。进一步对比各模型中互联网信息技术应用变量的系数，发现那些使用互联网进行商业、学习和工作活动频率高的群体，互联网信息技术对其风险态度的正向影响要明显高于其他群体。

表3 互联网信息技术与乡村居民风险态度：使用方式（学习）的异质性

因变量： 风险态度	学习频率高		学习频率低	
	主观风险态度	客观风险态度	主观风险态度	客观风险态度
互联网信息技术	0.0591*** (0.0120)	0.1143*** (0.0352)	0.0197 (0.0180)	-0.0150 (0.0524)
传统信息渠道1	-0.0100 (0.0111)	0.0137 (0.0349)	-0.0390** (0.0177)	-0.0324 (0.0498)
传统信息渠道2	0.0352** (0.0140)	0.0008 (0.0408)	0.00641 (0.0222)	0.0322 (0.0621)
传统信息渠道3	-0.0115 (0.0107)	-0.0556* (0.0338)	-0.0104 (0.0176)	0.0427 (0.0502)
控制个体特征	是	是	是	是
控制家庭特征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7739	7865	3041	3055

表4 互联网信息技术与乡村居民风险态度：使用方式（工作）的异质性

因变量： 风险态度	工作频率高		工作频率低	
	主观风险态度	客观风险态度	主观风险态度	客观风险态度
互联网信息技术	0.0549*** (0.0112)	0.1014*** (0.0328)	0.0390* (0.0203)	-0.0159 (0.0624)

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应用如何缓解乡村居民风险厌恶态度？

传统信息渠道1	-0.0197* (0.0106)	0.0112 (0.0327)	-0.0274 (0.0201)	-0.0402 (0.0621)
传统信息渠道2	0.0362*** (0.0133)	0.0292 (0.0380)	-0.0004 (0.0252)	-0.0805 (0.0844)
传统信息渠道3	-0.0081 (0.0103)	-0.0367 (0.0320)	-0.0266 (0.0198)	0.0166 (0.0607)
控制个体特征	是	是	是	是
控制家庭特征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8400	8526	2380	2394

表5 互联网信息技术与乡村居民风险态度：使用方式（社交）的异质性

因变量： 风险态度	社交频率高		社交频率低	
	主观风险态度	客观风险态度	主观风险态度	客观风险态度
互联网信息技术	0.0490*** (0.0098)	0.0851*** (0.0296)	0.0357 (0.0380)	-0.1301 (0.1073)
传统信息渠道1	-0.0251*** (0.0097)	-0.0179 (0.0297)	0.0368 (0.0372)	0.2064* (0.119)
传统信息渠道2	0.0269** (0.0121)	0.0278 (0.0349)	0.0537 (0.0456)	-0.0543 (0.1430)
传统信息渠道3	-0.0094 (0.0094)	-0.0246 (0.0291)	-0.0279 (0.0369)	0.0179 (0.1122)
控制个体特征	是	是	是	是
控制家庭特征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10125	10262	655	658

表6 互联网信息技术与乡村居民风险态度：使用方式（娱乐）的异质性

因变量： 风险态度	娱乐频率高		娱乐频率低	
	主观风险态度	客观风险态度	主观风险态度	客观风险态度
互联网信息技术	0.0532*** (0.0099)	0.0991*** (0.0295)	0.0056 (0.0330)	-0.1541 (0.1000)
传统信息渠道1	-0.0248** (0.0098)	0.00831 (0.0301)	0.0184 (0.0323)	-0.0507 (0.0951)
传统信息渠道2	0.0275** (0.0122)	0.0292 (0.0350)	0.0240 (0.0397)	-0.0029 (0.1301)
传统信息渠道3	-0.0047 (0.0095)	-0.0486* (0.0295)	-0.0702** (0.0328)	0.1873* (0.1012)
控制个体特征	是	是	是	是
控制家庭特征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9929	10063	851	857

表7 互联网信息技术与乡村居民风险态度：使用方式（商业）的异质性

因变量： 风险态度	商业频率高		商业频率低	
	主观风险态度	客观风险态度	主观风险态度	客观风险态度
互联网信息技术	0.0706*** (0.0121)	0.115*** (0.0356)	0.0117 (0.0174)	-0.0110 (0.0523)
传统信息渠道1	-0.0102 (0.0113)	-0.0048 (0.0348)	-0.0420** (0.0173)	0.0113 (0.0510)
传统信息渠道2	0.0271* (0.0150)	0.0157 (0.0420)	0.0241 (0.0201)	-0.0054 (0.0602)
传统信息渠道3	-0.0010 (0.0109)	-0.0227 (0.0342)	-0.0368** (0.0168)	-0.0475 (0.0505)
控制个体特征	是	是	是	是
控制家庭特征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7437	7564	3343	3356

(二) 互联网信息技术、个体特征与风险态度

根据前文文献总结，个体认知与学习能力、财富水平和个人经历等均是影响个体风险态度的重要因素。尽管前文讨论了互联网信息技术对不同使用方式群体的影响差异，但本文尚没有从居民个体特征差异方面对互联网信息技术应用的影响进行讨论。为了加深对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应用通过何种途径以及机理对乡村居民的风险态度产生影响的认识，本文以下部分进一步从乡村居民个体特征异质性的视角考察哪类居民群体的风险态度受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影响更强。本文以下部分按照学习动力、学习能力、财富水平和人生重大经历情况对乡村居民样本进行分组，分别考察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应用对有着不同个体特征样本风险态度的影响。

1.学习动力的异质性。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应用需要使用者有一定的主观学习动力和学习能力才能发挥作用。如果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应用所带来的信息获取模式的改变能对乡村居民的风险态度产生影响，那么一个合理的预期是：互联网对那些有学习主观能动性和学习能力的乡村居民的风险态度产生的影响更加显著。本文以下按照乡村居民对 CFPS 调查问题“平时是否读书”的回答为分类标准将总体样本分为有主动学习习惯的样本组和无主动学习习惯的样本组，分别进行实证分析。表 8 展示了两类样本的回归结果。结果发现，对于有主动学习习惯的乡村居民而言，无论是主观风险态度模型还是客观风险态度模型，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应用均在 1%统计水平上对乡村居民的风险态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于无主动学习习惯的乡村居民，在两类风险态度模型中，互联网信息技术变量的系数均不显著。因此，考虑到居民个人学习主动性的特征之后，本文发现对于无主动学习习惯的乡村居民，互联网信息技术并没有表现出对其风险态度的显著影响，而那些有主动学习习惯的乡村居民，对应用互联网信息技术获取信息的依赖度越高，其风险厌恶态度的改善程度也越明显。

表 8 互联网信息技术与乡村居民风险态度：学习动力的异质性

因变量： 风险态度	有主动学习习惯		无主动学习习惯	
	主观风险态度	客观风险态度	主观风险态度	客观风险态度
互联网信息技术	0.0706***	0.1152***	0.0117	-0.0110

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应用如何缓解乡村居民风险厌恶态度？

	(0.0121)	(0.0356)	(0.0174)	(0.0523)
传统信息渠道1	-0.0102	-0.0048	-0.0420**	0.0113
	(0.0113)	(0.0348)	(0.0173)	(0.0510)
传统信息渠道2	0.0271*	0.0157	0.0241	-0.0054
	(0.0145)	(0.0420)	(0.0201)	(0.0602)
传统信息渠道3	-0.0010	-0.0227	-0.0368**	-0.0475
	(0.0109)	(0.0342)	(0.0168)	(0.0505)
控制个体特征	是	是	是	是
控制家庭特征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7437	7564	3343	3356

2.学习能力的异质性。以上模型结果展示了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应用对不同学习主观能动性乡村居民的风险态度有着不同的影响。但是从更为准确的角度来说，这种差异化的影响其实与乡村居民的学习能力有关。随着互联网生态的不断发展，互联网所联通的各类信息也愈加丰富，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应用对乡村居民思想观念的影响力大小与其的学习与理解能力息息相关。学习能力强的居民可以更好地挖掘互联网所联通的丰富信息的内在价值，其思想观念受到的影响程度也越深。

所以表8所展示的回归结果实际上隐含了一个假设：有主动学习习惯的乡村居民其学习能力也越强。为了更为准确地衡量乡村居民的学习能力，本文以乡村居民的实际受教育年限为其学习能力的度量指标。原因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受教育年限越久越有助于提升学习能力；另一方面，学习能力越强的个体更倾向于接受时间更久的正规教育。因此实际受教育年限可以更准确地衡量乡村居民的学习能力。下文模型以乡村居民实际受教育年限均值为界，将样本分为相对高受教育年限和相对低受教育年限两类子样本，分别进行回归以检验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应用对两类乡村居民风险态度的影响。如果信息技术在乡村的普及影响了乡村居民的风险态度，那么本文预期这种影响对那些高受教育年限的居民更加显著。

表9展示了两类样本的模型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应用显著提升了两类乡村居民的主观风险态度。对比模型系数，高受教育年限乡村居民样本主观风险态度受到的正向影响更大。对于客观风险态度，回归结果发现：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应用显著提升了高受教育年限乡村居民的客观风险态度，而对于受教育年限较低的乡村居民，其影响则并不显著。

表9 互联网信息技术与乡村居民风险态度：学习能力的异质性

因变量： 风险态度	高受教育年限		低受教育年限	
	主观风险态度	客观风险态度	主观风险态度	客观风险态度
互联网信息技术	0.0518*** (0.0137)	0.0953** (0.0371)	0.0462*** (0.0134)	0.0581 (0.0445)
传统信息渠道1	-0.0131 (0.0126)	-0.0335 (0.0374)	-0.0288** (0.0141)	0.0429 (0.0444)
传统信息渠道2	0.0221 (0.0181)	0.0438 (0.0410)	0.0379** (0.0155)	0.0272 (0.0565)

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应用如何缓解乡村居民风险厌恶态度？

传统信息渠道3	-0.0048 (0.0122)	-0.0347 (0.0370)	-0.0224 (0.0138)	-0.0192 (0.0417)
控制个体特征	是	是	是	是
控制家庭特征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4982	5001	5798	5920

3. 财富水平的异质性。以下模型使用乡村居民的家庭财富均值为分类标准，将总体样本分为相对高财富水平组和相对低财富水平组，分别对两组样本进行实证分析，回归结果如表 10 所示。结果发现，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应用均可显著提升两类乡村居民样本的主观和客观风险偏好程度，但是从系数大小比较来看，相对高财富水平乡村居民样本的风险态度所受正向影响更大。

表 10 互联网信息技术与乡村居民风险态度：财富水平的异质性

因变量： 风险态度	高财富水平		低财富水平	
	主观风险态度	客观风险态度	主观风险态度	客观风险态度
互联网信息技术	0.0530*** (0.0196)	0.0974*** (0.0362)	0.0467*** (0.0108)	0.0867* (0.0486)
传统信息渠道1	-0.0376* (0.0201)	-0.0050 (0.0364)	-0.0155 (0.0106)	-0.0123 (0.0486)
传统信息渠道2	0.0328 (0.0240)	0.0917** (0.0409)	0.0281** (0.0134)	-0.1163* (0.0686)
传统信息渠道3	-0.0442** (0.0194)	-0.0276 (0.0357)	-0.0015 (0.0103)	-0.0131 (0.0475)
控制个体特征	是	是	是	是
控制家庭特征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2468	2493	8312	8428

4. 个人经历的异质性。陈永伟、陈立中（2016）、Dohmen et al.（2016）和 Banks et al.（2019）的研究都发现了人生中的重大经历对个人的风险偏好程度具有显著影响。本文整理了 CFPS 2014 年、2016 年、2018 年三年的调查数据，根据乡村居民在 2018 年及过去 5 年内是否有过住院或 12 个月以上失业经历作为个人是否有重大人生经历的代理变量（如果分别考虑住院经历或失业经历，两者的样本量都较小，因为两者都属于人生的重大变故或是挫折，在此本文合并考虑这两种人生经历以构造个人经历虚拟变量）。本文将总体样本分为有重大人生经历和无重大人生经历的两组。首先，表 11 展示了两组样本居民的主客观风险态度变量的均值检验结果。从数据可以看出，有重大人生经历的居民无论是主观或是客观风险态度均比无重大人生经历的居民要保守。这意味着重大人生经历会使得个人趋于风险厌恶。原因可能是经历过重大人生变故后，个人会心生出一种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恐惧”，从而更加倾向于厌恶风险。

为了探讨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应用对这两类样本风险态度影响的差异，本文对两类样本分别进行实证分析。表 12 报告了模型回归结果。结果发现：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应用均可显著提升两类乡村居民样本的主观和客观风险偏好程度。并且从系数大小比较来看，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应用对有人生重大经

历乡村居民的风险厌恶态度的改善作用更大。从表 11 均值检验结果已经发现，有人生重大经历的样本相对无人人生重大经历的样本其风险态度显著偏向于保守，而分样本实证分析发现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应用对有人生重大经历乡村居民的风险厌恶态度的改善作用更大则说明：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应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由于人生重大挫折经历对乡村居民风险态度带来的负面影响。这些结果印证了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应用可以通过信息效应途径减弱乡村居民对不确定性的“恐惧”，从而缓解其风险厌恶态度。

表 11 不同人生经历样本主客观风险态度的均值检验

	无人人生重大经历			有人生重大经历			均值差
	N	Mean	Std.dev.	N	Mean	Std.dev.	
主观风险态度	12473	2.2189	1.7660	3338	2.0886	1.7036	0.1302***
客观风险态度	12722	0.0189	0.1360	3444	0.0151	0.1219	0.0038**

表 12 互联网信息技术与乡村居民风险态度：人生经历的异质性

因变量： 风险态度	无人人生重大经历		有人生重大经历	
	主观风险态度	客观风险态度	主观风险态度	客观风险态度
互联网信息技术	0.0484*** (0.0119)	0.0637* (0.0346)	0.0874*** (0.0248)	0.1410* (0.0744)
传统信息渠道1	-0.0202* (0.0120)	-0.0125 (0.0361)	-0.0192 (0.0228)	-0.0009 (0.0721)
传统信息渠道2	0.0288* (0.0149)	0.0573 (0.0417)	0.0093 (0.0296)	0.0077 (0.0888)
传统信息渠道3	-0.0193* (0.0116)	-0.0326 (0.0350)	0.0117 (0.0229)	-0.0884 (0.0731)
控制个体特征	是	是	是	是
控制家庭特征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6694	6776	1775	1812

(三) 稳健性检验^①

1.内生性分析。在前文模型中，本文控制了诸多影响风险态度个体层面和家庭层面的相关变量。并且本文已经阐述，2016 年乡村居民对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应用主要是受信息基础设施完备和智能设备普及等外生因素的影响。进一步地，在理论上乡村居民对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应用选择受其风险态度的影响也缺乏证据。因此本文模型存在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互为因果导致内生性问题的可能性不大。

即使如此，为了消除对模型内生性的怀疑，本文参考了周广肃、樊纲（2018）的方法，选取 2014 年 CFPS 调查问卷中“家庭是否拥有电脑”的调查数据构造本文的工具变量，进而设置包含工具变量的 Ordered Probit 模型和 Probit 模型来验证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应用对乡村居民主客观风险态度的影响是否稳健。经过检验，工具变量对乡村居民风险态度的正向影响不变，与前文结论一致。

2.对变量、样本进行调整。本文还做了以下稳健性检验：①为了对核心变量的影响进行多角度验

^①限于文章篇幅，本文略去稳健性检验相关模型的回归结果，欢迎感兴趣的读者联系作者索取。

证，本文还利用 CFPS 问卷中样本对“是否移动上网”“是否使用手机”等问题的回答数据构造了互联网信息技术应用的替代变量，替换原核心解释变量代入前文的实证模型进行了稳健性检验。检验结果显示，替换变量仍然表现出了对乡村居民风险态度显著的正向影响。^②进一步地，本文还对模型数据进行了处理，然后将处理后的数据代入原模型进行回归，以检验模型结果的稳健性。具体地，首先考虑到乡村地区年长者的思想观念可能较难受外部因素的影响而发生改变，因此在处理数据中，本文剔除了年龄为 60 岁及以上的乡村居民样本。其次，为了防止样本数据中可能存在的异常值影响模型回归结果，本文还对样本中的连续变量进行了双边缩尾处理。并且参照已有研究的处理，为了讨论年龄与风险态度之间的非线性关系（Dohmen et al., 2011），本文还在模型中加入了年龄的平方项变量。最后把经过以上处理的数据代入原模型进行回归后，发现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应用对乡村居民风险厌恶态度的正向改善影响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六、总结

当今世界，信息技术创新日新月异，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深入发展。信息技术的普及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质上，信息技术是通过促使人们思想观念、行为的改变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的变革。本文选择乡村居民为关注对象，以风险态度为研究视角，运用微观数据实证分析了互联网信息技术通过改变乡村居民信息获取模式对其风险态度的影响。

本文研究发现，首先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应用可以显著缓解长时间处于信息劣势乡村居民群体的风险厌恶态度。虽然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应用对乡村居民的主观风险态度均有显著的正向改善作用，但是两类风险态度的其他影响因素却存在着一些差异。其次，本文分析了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应用对不同使用方式样本风险态度影响的异质性。结果发现，虽然使用方式与目的各有不同，但是共同的是，无论是何种使用方式与目的，使用互联网频率越高的群体，其风险态度所受的正向影响越大；而对使用频率低的群体，互联网信息技术应用的影响则多不显著。最后，本文还针对乡村居民个体特征中的学习动力、学习能力、财富水平和个人经历方面展开了异质性分析，发现对那些有主动学习习惯、受教育年限久、财富水平高和有过人生重大经历的乡村居民，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应用对其风险态度的正向影响更加显著。

本文的研究为信息技术的普及与乡村居民风险态度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系统性证据。风险态度是影响居民生产、择业、投资和消费等行为的重要因素，乡村居民风险厌恶态度的改善有利于在乡村区域内生出改变乡村贫困落后发展面貌现状的动力，这有助于探索出一条乡村居民脱贫和乡村良性发展的长效机制。本文的研究结论主要有以下政策含义：首先，信息技术的普及对改变乡村居民思想观念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有助于扭转存在于乡村居民群体中的厌恶风险、因循守旧的思想观念，因此要继续推进乡村地区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落实数字乡村发展战略。其次，在推进信息技术普及的同时，要注重引导乡村居民对信息技术的使用方式，以更好地发挥信息技术的正向作用。并且，还要重视对不同个体特征乡村居民的引导，加强乡村文化建设、提升乡村居民财富与收入水平，使得乡村居民能更好地享有信息技术普及所带来的数字红利。

参考文献

- 1.陈波, 2009: 《风险态度对回乡创业行为影响的实证研究》, 《管理世界》第3期。
- 2.陈永伟、陈立中, 2016: 《早年经历怎样影响投资行为:以“大饥荒”为例》, 《经济学报》第4期。
- 3.陈永伟、史宇鹏、权五燮, 2015: 《住房财富、金融市场参与和家庭资产组合选择——来自中国城市的证据》, 《金融研究》第4期。
- 4.陈其进、陈华, 2014: 《中国居民个体风险态度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城镇居民、农民工和农村居民的对比研究》, 《上海经济研究》第12期。
- 5.高杨、牛子恒, 2019: 《风险厌恶、信息获取能力与农户绿色防控技术采纳行为分析》, 《中国农村经济》第8期。
- 6.侯麟科、仇焕广、白军飞、徐志刚, 2014: 《农户风险偏好对农业生产要素投入的影响——以农户玉米品种选择为例》, 《农业技术经济》第5期。
- 7.黄季焜、齐亮、陈瑞剑, 2008: 《技术信息知识、风险偏好与农民施用农药》, 《管理世界》第5期。
- 8.江小涓, 2017: 《高度联通社会中的资源重组与服务业增长》, 《经济研究》第3期。
- 9.李炬、阳镇、张雅倩, 2015: 《为什么投资者的主客观风险偏好存在差异——来自 CHFS 的微观证据》, 《南方经济》第11期。
- 10.刘潇、程志强、张琼, 2014: 《居民健康与金融投资偏好》, 《经济研究》第1期。
- 11.毛慧、周力、应瑞瑶, 2018: 《风险偏好与农户技术采纳行为分析——基于契约农业视角再考察》, 《中国农村经济》第4期。
- 12.王迪、王汉生, 2016: 《移动互联网的崛起与社会变迁》, 《中国社会科学》第7期。
- 13.许承明、张建军, 2012: 《社会资本、异质性风险偏好影响农户信贷与保险互联选择研究》, 《财贸经济》第12期。
- 14.张光利、刘小元, 2018: 《住房价格与居民风险偏好》, 《经济研究》第1期。
- 15.张海鹏, 2019: 《中国城乡关系演变70年:从分割到融合》, 《当代中国史研究》第3期。
- 16.周广肃、樊纲, 2018: 《互联网使用与家庭创业选择——来自 CFPS 数据的验证》, 《经济评论》第5期。
- 17.Arrondel, L., and B. Lefebvre, 2001, “Behavior of Household Portfolios in France: The Role of Housing”,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47: 489-514.
- 18.Banks, J., E. Bassoli, and I. Mammi, 2019, “Changing Attitudes to Risk at Older Ages: The Role of Health and Other Life Events”, *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 79: 1-20.
- 19.Bargh, J. A., K. Y. A. McKenna, 2004, “The Internet and Social Life”,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55(1):573-590.
- 20.Bonsang, E., and T. Dohmen, 2015, “Risk Attitude and Cognitive Aging”,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112(C): 112-126.
- 21.Bradford, L. B., J. Chavas, D. Fitz, V. Rios-Salas, and L. Schechter, 2015, “Risk, Learning, and Technology Adoption”, *Agricultural Economics*, 46(1): 11-24.

22. Brick, K., and M. Visser, 2015, "Risk Preferences, Technology Adoption and Insurance Uptake: A Framed Experi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118: 383-396.
23. Bucciol, A., and L. Zarri, 2017, "Do Personality Traits Influence Investors' Portfolios?", *Journal of Behavioral and Experimental Economics*, 68: 1-12.
24. Caliendo, M., F. M. Fossen, and A. S. Kritikos, 2010, "The Impact of Risk Attitudes on Entrepreneurial Survival",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76(1), 45-63.
25. Cocco, J. F., 2005, "Portfolio Choice in The Presence of Housing", *The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18(2): 535-567.
26. Dohmen, T., A. Falk, D. Huffman, U. Sunde, J. Schupp, G. Wagner, 2011, "Individual Risk Attitudes: Measurement, Determinants, and Behavioral Consequences",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9(3): 522-550.
27. Dohmen, T., H. Lehmann, and N. Pignatti, 2016, "Time-varying Individual Risk Attitudes over The Great Recession: A Comparison of Germany and Ukraine",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44(1): 182-200.
28. Djankov, S., Y. Qian, G. Roland, and E. Zhuravskaya, 2006, "Who Are China's Entrepreneur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6(2): 348-352.
29. Fenghua, L., 2013, "Students Risk Attitudes in College Choice Game under Information Constrain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Business and Education Technology*.
30. Gao, Y., X. Zhang, J. Lu, L. Wu, and S. Yin, 2017, "Adoption Behavior of Green Control Techniques by Family Farms in China: Evidence from 676 Family Farms in Huang-Huai-Hai Plain", *Crop Protection*, 99(9): 76-84.
31. Gary, C., V. Angelino, 2012, "Three Risk-Elicitation Methods in The Field: Evidence from Rural Senegal", *Review of Behavioral Economics*, 3(2): 145-171.
32. Ghadim, A. K., D. J. Pannell, and M. P. Burton, 2005, "Risk, Uncertainty, and Learning in Adoption of A Crop Innovation", *Agricultural Economics*, 33(1): 1-9.
33. Gollier, C., 2002, "Time Diversification, Liquidity Constraints, and Decreasing Aversion to Risk on Wealth",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49(7): 1439-1459.
34. Guiso, L., M. Paiella, 2008, "Risk Aversion, Wealth, and Background Risk",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6(6): 1109-1150.
35. Haliassos, M., and C. C. Bertaut, 1995, "Why Do So Few Hold Stocks?", *Economic Journal*, 105: 1110-1129.
36. Hammitt, J., K. Haninger, and N. Treich, 2009, "Effects of Health and Longevity on Financial Risk Tolerance", *The Geneva Risk and Insurance Review*, 34(2): 117-139.
37. Hanna, S. D., and P. Chen, 1997,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Risk Tolerance: Implications for Optimal Portfolios", *Financial Counseling and Planning*, 8: 17-26.
38. Honarvar, B., K. B. Lankarani, A. Kharmandar, et al., 2020, "Knowledge, Attitudes, Risk Perceptions, and Practices of Adults toward COVID-19: A Population and Field-Based Study from Ir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65: 731-739.
39. Kapteyn, A., and F. Teppa, 2011, "Subjective Measures of Risk Aversion, Fixed Costs, and Portfolio Choice", *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 32(4): 564-580.

40.Liu, E. M., 2013, "Time to Change What to Sow: Risk Preferences and Technology Adoption Decisions of Cotton Farmers in China",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95(4): 1386-1403.

41.Outreville, J. F., 2013,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lative Risk Aversion and The Level of Education: A Survey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Demand for Life Insurance", *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s*, 29(1): 97-111.

42.Pfeifer, C., 2011, "Risk Aversion and Sorting into Public Sector Employment", *German Economic Review*, 12(1): 85-99.

43.Sahm, C., 2012, "How Much Does Risk Tolerance Change?", *Quarterly Journal of Finance*, 02(4): 1-38.

44.Wijayarathna, K. P., and V. V. Dixit, 2016, "Impact of Information on Risk Attitudes: Implications on Valuation of Reliability and Information", *Journal of Choice Modelling*, 20: 16-34.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

(责任编辑：陈静怡)

How Ca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Internet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Alleviate Rural Residents' Risk Aversion Attitude? An Analysis Based on the Micro Data of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Zhang Shihu Gu Haiying

Abstract: In the past, due to geographical and institutional isolations, rural residents have been in a disadvantageous position compared with urban residents in terms of access to information. To some extent, this has led to a risk aversion attitude and conformism for some rural residents, which further generated development difficulties in rural areas.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o solve the dilemma of rural development, it is important to change the sense of risk aversion of rural residents. The study uses the micro data of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 to evaluate the important impact of the Internet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on rural residents' risk attitud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application of the Internet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risk preference attitudes of rural residents. In addition, although rural residents have different ways and purposes of using the Internet, the higher the frequency of the Internet use, the more significant the positive impact on their risk attitude. Finally, the study analyzes the heterogeneity of rural residents'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and finds that the application of the Internet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is more conducive to improving the degree of risk preference attitudes among those who have active learning habits, long education years, high wealth level and critical life experience.

Key Words: The Internet; Rural resident; Risk Attitude; Rural Revitalization